

報海雜憶

■ 顧 執 中 著
■ 中 國 文 史 出 版 社

報
海
雜
憶

顧
執
中
著

125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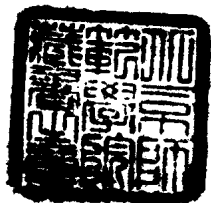
憶雜海報

顧執中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94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1069410

责任编辑：丁小梅

报 海 杂 忆

顾执中 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6年5月第一版·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插页：1 字数：98千字

印数：1—5,500册 定价：0.85元

统一书号：11224·198

写 在 前 面

顾执中先生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今年八十七岁。他在新闻战线上的数十年奋斗以及丰富的采访经验都是值得称道的。

顾执中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教育家。他曾于一九二八年冬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历时二十余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新闻专科人才。目前，许多当年的民治新专学生正活跃在我国新闻出版战线上。

象很多人一样，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风暴也把顾执中卷进去了。于是他蛰居在北京宣武门外一条小胡同里，每天闭门写作。他用毛笔在旧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取名《昔非今比》，稿中谈往论今，热情地讴歌了新中国。一九八一年，我们在顾老那里看到了这本书稿。征得顾老同意后，我们把其中的主要章节摘录成书，定名为《报海杂忆》，奉献给广大读者。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我当上了记者	(1)
五卅惨案	(4)
谢福生虎口逃生	(8)
四一二事变前后	(9)
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	(15)
蒋宋结婚	(17)
国民党四中全会	(19)
在第二集团军当随军记者	(23)
五三惨案及北上采访	(26)
1. 在泰安	(26)
2. 只身北上	(29)
3. 张作霖出走前的北京	(30)
4. 北京落入蒋介石之手	(33)
5. 调查五三惨案	(36)
第一次到东北	(37)
九一八事变	(38)
1. 六三花园的招待	(38)
2. 沈阳之行	(39)
3. 跟学生们到南京请愿	(41)
陈友仁	(44)
一二八抗战	(45)
随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	(52)

民权保障大同盟·····	(58)
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	(59)
我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61)
纪念五卅大会·····	(63)
领导上海北站的群众请愿·····	(65)
我参加了国难教育社·····	(67)
吴铁城破坏九一八纪念大会·····	(67)
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之行·····	(69)
七七事变的爆发·····	(74)
八一三上海抗战·····	(75)
“星二聚餐会”·····	(81)
慰劳第三战区·····	(84)
我被敌伪狙击·····	(91)
第一次到重庆·····	(103)
当设计委员·····	(104)
抗战胜利前后·····	(106)
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107)
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	(109)
我参加了九三学社·····	(111)
再次逃往香港·····	(113)
从香港到天津·····	(114)
来到北平·····	(116)
后 记·····	(119)

报海杂忆

顾 执 中

一八九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现在我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回首往事，报海浮沉数十年，历尽人间沧桑。长期报海生活中那些经历过的事情使我难忘，觉得应该记下来供读者一阅，作为研究现代历史的参考。

我当上了记者

我家在浦东南汇县周浦镇，这个镇距离上海市区只有十几里地，是个小镇。镇上一品斋生产的豆腐干和三阳南货店的火炙糕却远近闻名。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木匠。父亲却读了几年书，能够到地主家去教教门馆，但生活也艰难得很，常靠借债度日。几年之后，满身是债。每逢除夕，父亲外出躲债，债主们提着灯笼来家讨债，挤在屋里，坐着不走。母亲忙着说好话应付他们，真是不堪其苦。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为了躲债，我们全家只好携带随身东西秘密地逃往上海，离开了故乡。在上海，父亲仍然找不到正式工作。连年失业，吃尽当光，连脚桶、铜壶等物，只要当铺能要的东西都典质一空。那时我虽年幼，却学会了当东西。每次出门，我拿着父亲交给我典当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走向当铺。当铺门口，墙上大书一个吓人的“当”字。我来到当铺门口，因为典当东西是件丢脸的事，害怕被人瞧见，先看看周围有熟人没有，没有发现熟人，我就轻轻地跨进当铺，再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肯定没有熟人了，我才拿出要当的东西，走到

高与人齐的柜台前，双手把东西捧上去。朝奉（即当铺先生）用戴着老花眼镜的眼睛看了看东西，故意表示不要，我低声哀求，他才表示可以收下，然后向帐房唱出所当的东西和当的钱数。帐房写好当票，由朝奉把当票和钱一并交给我。我握着这来之不易的钱，感到一阵心酸，赶紧跑回家中，把当票和钱如数交给父亲，好买米做饭。

父亲教我识字。他先按照《千字文》教我学方块字，后来读那时的新书《蒙学课本》。稍大一点以后，我学会看小说，又读《左传》、《古文观止》。父亲给我取名“执中”，号“效汤”，这是从“汤执中，立言无方”的典故中引出来的，我嫌“效汤”这个名字不好听，一直没有用过。父亲失业三年之后，有位邻居劝我父亲说，你既有文化，为何不去开办一所学校，自己教书谋生呢？父亲接受了他的意见，借些钱，开设了一所养中学校（地址在上海的南无锡路），我们家的生活才勉强能够维持。我也在父亲设的小学校里读书。那时父亲加入了基督教，江长川牧师介绍我考入教会学校中西中学读书。中西中学的前身叫中西书院，后来改名为东吴大学，其原来校址就改建为中西中学，后来又改名为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我在那里读了五年书毕业。东吴二中几年的学习生活，使我获得了良好的英语基础，这所中学很多课程都使用英语课本，由外籍教师教学。我苦学了几年，英语大有长进，这对我后来采访外交新闻很有帮助。东吴二中毕业以后，我是全班同学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可以免费进入东吴大学或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学习，但为了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我只好放弃升学的念头。从一九一九年起，我就跨进社会，为衣食奔波，当过店员、描图员，到母校代课。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我在基督教慕义堂任理事，后来获得一个机会到工部局外国监牢教外国人说上海话。以后又调到工部局所属救火会、水上巡捕房去教外国人说华语。这样我就比较多地接触到外国人，英语说得更好。工作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我可以看懂英语报纸、杂志，甚至开始为英文月刊



顾执中保存的部分记者证

写稿。但最后我却进入报馆当了新闻记者，一直干了三十二年，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在上海市区比较热闹的地方有一条路叫山东路，这条路中间从九江路到福州路的一段叫望平街，从福州路再往南叫麦家圈。那时上海的所有报馆几乎都集中在望平街上，从北到南，隔开几步，就可以看见一家报馆。在最北端的是《民国日报》，在汉口路山东路拐角或其附近的有《申报》和《新闻报》，再往南有《时事新报》。在望平街

上各据一隅、望楹相对者有《时报》和《商报》。这种报馆集中的情况跟伦敦的报纸多集中在舰队街（Fleet St）的情况相仿佛。

为什么上海的报馆多集中在一处呢？这无疑是为了便于发行的关系。原来上海的报纸都没有自己的发行组织与发行网，每天早上五时左右报纸印出后，即批发给报贩。按月看报的读者向报贩订报，零星看报的读者也向报贩买报。为了及早使报纸到达读者手中，报贩早上的时间十分紧张。这样，报馆集中在一处，就可以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和距离内取得各种报纸，并以最迅捷的行动分送和贩卖早上新出版的报纸了。由于这种原因，新开办的报馆，除非自己有发行力量可以设在别处外，都得设立在这

里。否则，设在离望平街稍远之地，报贩便不给它推销报纸，这家报馆就不能存在。这种情况直到七七抗战之后，才稍有改变。

我最初在《时报》当记者，后来一直在《新闻报》工作。下面就谈谈我历年采访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报海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五卅惨案

一九二五年，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前，我已当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那时我的任务偏重于采访社会新闻。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前夕，上海的日本纱厂早已把中国男女工人当作亡国奴看待，待遇非常刻薄。车间中的日本工头往往无故毒打中国工人，引起工人罢工。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西区日商内外棉厂的日本工头竟疯狂地开枪，十余工人受伤。顾正红受重伤，医治无效，十七日身亡。消息传出，群众非常愤慨。那时上海西区有不少新设立的规模小、设备差、没有自己的校舍，只赁租赁几幢旧洋房上课的私立大学，如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这些学校办得很有成绩，但是一些洋奴味十足的上海人，称呼那些帝国主义所办的、有洋房大厦的学校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为正规学校，却称上述这些大学为“野鸡”学校。就是这些“野鸡”学校的学生，虽然生活相当困难，但对受苦的工人却异常同情。他们的校址距离顾正红烈士工作的日本纱厂近，消息灵通，于是他们就毫无顾虑地行动起来，用实际力量支持被日本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工人。他们成群结队在上海西区向行人演讲宣传，并举行募捐，支持和救济因罢工而生活陷于困难的工人同胞们。相反的，那些“正规”学校的大学生只埋头读书，对革命斗争无动于衷。

这时，英帝国主义者助纣为虐，派出大批武装探捕，任意殴打与拘捕在沪西一带进行宣传 and 捐款的学生。广大群众决定予以反击，在五月三十日下午把反帝斗争从人烟相对较少的沪西区，推进到上海公共租界最热闹的中心，即南京路、浙江路交叉

点，永安公司与先施公司高高对峙的南京路一带。

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照例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选择这一天游行示威，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这一地区属于老闸捕房管辖。那时老闸捕房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后门，在贵州路上，另一个是前门，在南京路上先施、永安两公司之西，距两公司只有很短的路。五卅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运动，把捕房位于南京路的大门堵塞了。因为南京路上人最多，一发生事故，人群象潮水般地拥入捕房，帝国主义者即使使用武力，也难抵抗，没有办法，只好堵住这个门，只留贵州路的一个门。那时，永安公司西侧有一个现在已不存在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上层，就是工部局的市政厅，所有工部局的董事会、纳税人会等都在这里举行。建筑物下层的后部，是鱼肉菜蔬市场。当时上海人都称这建筑物为“铁房子小菜场”。五卅后，工部局把这个铁房子小菜场出卖给商人，拆去后建为新雅酒楼等企业。

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时左右，工人学生群众分批来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附近，向市民演讲宣传。聚而听者，愈来愈多。这时公共租界所有的捕房，特别是老闸捕房，早就做好了准备，西捕持手枪，印捕、华捕各负步枪，中西便衣侦探也暗藏武器，分头密布在这一段南京路上。老闸捕房南京路上的大门警备更为森严，门首不但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巡捕，成列成行地排在门的左右两侧，而且还有从救火会调来的皮带车。这是预备一开枪，群众的鲜血流出来后，立刻用它来冲洗地上的血迹，以消灭其犯罪的痕迹。

象野兽般的英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最初对群众乱挥警棍，企图把他们驱散。勇敢的游行者的早已把死生置之度外，在这一段最热闹的南京路上，有的人依然站立在高处，大声向群众演讲。一时人如潮涌。英帝国主义者下令抓人，被抓的人都被巡捕或侦探们拖到老闸捕房，拳打脚踢，拘留起来。群众怒不可遏，最

后，当探捕们又抓了一批人要押进南京路的老闸捕房时，群众一涌上前，向探捕们严厉地提出抗议。有些人紧紧跟随在探捕和被抓人的后面，愤怒地要进入捕房，责问巡捕乱抓人、乱打人的理由。不料在大门口负责指挥武装巡捕的英捕哀活生，见群众走近大门口，突然下令开枪。一时子弹横飞，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射来，群众被迫后退，南京路上即铁房子小菜场的前面，顿时洒满殷红的鲜血，死伤者躺在血泊中比比皆是。当场被英国士兵枪杀身死的工人、学生、市民等共十三人，身受重伤的十五人，被捕的五十余人。肇事后，英国士兵立即把死者重伤者拉走，并使用在事前准备好的救火会皮带车，把马路上的碧血冲洗干净。到了五点钟左右，路上已见不到血迹，可是五卅烈士们的热血散发的气味，在那里却淹滞不散接连多天，上海市民前往流泪凭吊的络绎不绝，全上海全中国立即掀起了波澜壮阔震惊全世界的反帝浪潮。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上海市民在市商会举行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市商会的四周，如北苏州路的大门、北河南路的侧门等，都属于公共租界范围，但市商会本身这一片小小的土地却属于中国地界。所以我们在那里举行大会，帝国主义者不能强行干涉，他们只派了些暗探，鬼鬼祟祟地混入人群中偷探消息。不到一点钟，参加大会的群众已象潮水般涌入市商会大礼堂，大家情绪激昂，十分拥挤。开会后，烈士家属纷纷登台，痛哭失声地向群众控诉英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要求大家为他们报仇。这时，一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象轰雷般地响起来。这个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主持的，由于不公开，我们不可能知道刘少奇、瞿秋白等同志在里面秘密领导。在那天的大会上，我们只看见台上有一位瘦长的、操着纯浦东口音的、名叫林钧的青年在主持会议。林钧的声音特别洪亮。那时开会没有扩音器，他的响亮的声音和为工人、市民容易听懂的浦东话音，使大会进行得极为顺利。从这天以后，全上海的大小工厂、大中小学校，大大小小的

商店，举行了规模极为浩大的大罢工、大罢课和大罢市，这都是这次大会定下来的。罢工、罢课、罢市持续进行了近两个月之久，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大受损失，在政治上也威信扫地。英国主义者吓得胆战心惊。数年后，有一个名叫伊登的英籍三道头巡捕，在四川路桥遇到一个日本水兵殴打中国人时，他不敢再袒护日本水兵，硬着头皮把那个日本水兵抓到捕房去，引起了日本陆战队的愤怒，就派兵包围捕房与工部局，最后英国向日本道歉了事。

五卅惨案后，我对英国人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我再也没有兴趣到捕房和救火会等处去采访消息。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也逐渐由社会新闻转变到其他方面。

五卅惨案后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春，帝国主义者企图愚弄中国人民，派了一个所谓“司法调查团”来到上海，对时隔近一年的五卅惨案进行所谓“调查”。调查团的委员长是美国法官约翰逊，他一到上海，就住进上海最豪华的西式旅社——大华饭店。他年约六十多岁，身材微胖，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他不拒绝接见新闻记者，一见了，就口口声声地说要主持公道。他选了个日子，在惨案发生地附近的铁房子小菜场的上层，即工部局市政厅，公开传集惨案肇事负责人等进行审讯。当时帝国主义的伪善面貌还没有完全被人识破，所以这一出“司法调查”的戏，尚能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

约翰逊等在市政厅设下了公座，邀请了有限的列席听询人员，面积不大的市政厅会场稀稀落落地坐了些人，也有报社代表，每一报社只准派一个记者参加。讯问整天进行，从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传讯肇事负责人员如巡长麦高云、指挥开枪的英捕哀活生、几个印捕、华捕以及被难家属和证人。讯问了好几天。我每天代表《时报》去采访，遇到英国人上堂供述时，则用英文速记记录。下午五六时回到报社，就动手把英文速记稿译成中文，每写好二三张，由编辑人员加工发排。这样手不停挥地

直到半夜一二点钟才写完，所写字数每次约五六千到一万左右。稿太长，连吃夜饭的时间也没有，请人家代买一碗面，一面写，一面吃。到下半夜二三点钟才回家休息。

司法调查的结果不久就发表了，对英国凶手只是免职了事，对死难家属只是给钱作为抚恤。这样的血海深仇，如此了事，中国人民岂能甘心呢？反帝斗争决不因帝国主义者扮演了这一出丑剧而停止。因此，一九二六年的五月三十日，上海市民又烈烈轰轰地起来纪念五卅运动。英帝国主义者素来不准游行示威，更不准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南京路和浙江路一带。尽管这样，纪念五卅惨案的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照样高擎旗帜标语，高呼口号，威武地通过了南京路浙江路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一九二六年对五卅惨案的纪念。

谢福生虎口逃生

我这里说的是上海新闻界中一个怪人物的故事。他生得又瘦又小，背稍驼，外貌不扬。但他的英文、法文却极好，无论英译中或中译英的口头翻译，他都可以临时随口流利地译出来。他往往在旅馆中开着房间，独自一人写文章，文章的稿费恰巧够付房租。他经济窘困，衣衫褴褛。这个人就是谢福生。

谢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的外文完全是由自己苦修学会的。起初他在上海办英文杂志，后来他独自一人办了一张英文报，中文名字叫《中国公论报》，英文名字叫《China Couier》，报社地点在四川路桥南堍的香港路。当时上海的中文报纸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双重压迫下，噤若寒蝉；外文报纸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所办，自然是反动势力的喉舌。但英文的《中国公论报》独能放胆来捋军阀的虎须，它的社论都写得很好。谢身虽小而胆实大。将近一九二六年年底，中国的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军阀们节节失败。谢把这些消息不但在其报纸上发布，而且把一张军阀孙传芳的照片，排印在新闻之中。照片之下用注目的黑体字标着“The Sett—

ing Sun”，讽刺得有趣味而又音义双关。“孙”字之音，其义在英文为“太阳”，他以落日来烘托“正在倒下去的孙传芳”，真是有趣。这个标题，果然刺痛了孙传芳。孙于盛怒之下，派人把谢从租界抓到龙华，要把谢砍头泄忿。

上海新闻界得悉谢被军阀逮捕的消息，极为震动。大家知道如果营救稍迟一步，谢的生命就难以保全。因此立即集合了几个在新闻界有显著地位的人，坐着汽车，驰往龙华见孙传芳，要求孙释放谢，并担保谢今后不会再有这种举动。因为行动迅捷，总算把谢从死神的手中救了出来。否则，只要隔一夜，谢福生就要成为北京《京报》邵飘萍那样的人了。

四一二事变前后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工人起义，一举击溃了孙传芳所部，完全占领了上海。这时，白崇禧乘机先进上海，不久蒋介石也来了。那时大家因为蒋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对于他的到来，都很重视。

帝国主义者对蒋来到上海，也极度关心。日本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英法的陆军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商团都动员起来，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黄浦江中帝国主义舰只如林，它们褪去了炮衣，准备随时轰射上海市民。因为汉口的英租界已于一月三日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由广大群众占领，帝国主义者军队露骨地准备着，如革命军冲进上海租界，就决定屠杀中国人民。当时上海市民以为蒋到来一定可以收回租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分子赶出去。上海人既高兴又紧张，都睁大两眼，注视着蒋介石的行动。

那时我已到《新闻报》工作，虽不跑巡捕房、救火会，但还不时到工部局刑事科去看看，一则看它所发表的消息，二则在暗中观察它的谍报人员活动情况。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半，我离家外出，先到工部局刑事科。我一踏进该科的招待室，就有人告

知我蒋介石已于本日到达上海，所有该科的中西重要人员都已外出。我急回《新闻报》，《新闻报》采访科的新闻记者也都行走一空，他们比我先到报馆，先得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消息，特别是负责采访政治新闻的蒋剑侯、杭石君都已乘汽车出发活动。我也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追踪前往。我先到枫林桥的外交部办事处，把名片递给警卫人员，要求见蒋介石。他们说蒋总司令确已到上海，但不在这里，而在龙华。我信以为真，立即命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往龙华。那里的警卫人员告诉我说，蒋总司令不是在龙华，是在枫林桥。于是我再回枫林桥，又向警卫人员提出请求，他们又用原来的话来欺骗我。我就老实告诉他们，我刚从龙华回来，肯定蒋是在这里，请他们把我的名片传递进去。他们知已不能再搪塞我，也就坦白地告诉我说，总司令确在里面，不过他通知我们不接见新闻记者。我再三请求，要他们把我的名片拿进去，给蒋看一下，如不接见，也就算了。他们无奈，有一个人拿我的名片到里面去转一下，一会儿出来答复我说，总司令不见。我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有个日本记者来了。我心想蒋是日本留学生，不会得罪日本人，极可能接见这个日本记者。如能把我的名片和日本记者的名片一起拿进去给蒋看，蒋会以为我是日本记者的朋友，就可能同时接见日本记者和我。于是，我对警卫人员说，总司令十分尊重外国记者，一定会接见的。请把我们二人的名片同时拿进去给蒋看。警卫人员的负责人不再拒绝，真的把我们二人的名片拿进去交给蒋。果然不到五分钟，里面有人出来说总司令有请。

这样，我跟那个日本记者（忘其名，也忘其报社）就从大门左侧的警卫队门口，经过一大片空地，进入那座正式的洋楼。登阶进门，看见楼下的会客室中，已经有大群新闻记者鸦雀无声地枯坐在那儿。所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记者已先我到达，但我和日本记者竟得先行上楼，为蒋所接见。这一局面，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们一上楼，刚走到走廊的窗口，蒋就出来见我们。他并不请我们进入室内坐下谈，而只是站在室外近窗口处谈了一下，极为匆促，可以看出他正在里面举行着一个极为秘密而重要的会议，只是不得已出来敷衍我们一下。我一见蒋，不讲寒暄，也没有时间跟他作由浅而深的谈话，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些很露骨的问题。我率直问他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是什么？租界应该不应该收回？如果帝国主义者竟敢动武，我们中国的态度应该怎样？他被我问得无言可答，每提一个问题，只答声“嗯”或“嗯、嗯”。我以为“嗯”也是很好的答复，也是在明显地表示他的态度，我就把这种“嗯”的答复，在报上发表出来。我在那天晚上回家时想，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人、军事上的总司令，态度竟如此暧昧，实使我疑窦丛生。在我的脑海中预感着一种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我和蒋谈话后，立即下楼。时华灯初上，已经到了傍晚六七点钟。我离开洋楼时，楼下一大群同业，犹在耐心地等着蒋介石的接见。他们直等到十时以后，才由蒋出来集体接见，所谈都是一些敷衍的辞句，处处显露出躲闪的态度。

从这一次以后，我几次采访蒋介石，每当我提出的问题他难以答复时，总是以“嗯、嗯”之音来回答。他以为可以用此掩盖其态度，相反地，却是相当明显地暴露了他的态度，所谓欲盖弥彰者，这就是一个实例。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到达上海以后，我细细留心他们对《新闻报》的态度，发现他们对《新闻报》不满。《新闻报》社址虽在租界，有租界的“保护”，也有那美国老板的“保护”，不怕封门，但也不能安心。因此它也不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来奉承蒋介石。

当时负责对上海宣传工作的是白崇禧的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陈群，宣传科科长是赵石龙，而在宣传科中一个最活跃的成员是李公朴。蒋既到上海，这个政治部就动员上海市民在南市的体育场举行欢迎蒋总司令大会；并在开会的那一